

臺灣無家者的污名： 針對其日常生活實踐戰術的分析

邱琪瑄*

投稿日期：2023 年 1 月 17 日；通過日期：2023 年 7 月 5 日。

* 邱琪瑄為玄奘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兼副院長、研發長，e-mail: chchiu223@hotmail.com。

本文引述格式：

邱琪瑄（2024）。〈臺灣無家者的污名：針對其日常生活實踐戰術的分析〉，《新聞學研究》，158: 1-55。https://doi.org/10.30386/MCR.202401.0001

《摘要》

遊民又雅稱無家者、街友，指的是居無定所、棲息街頭的人。過去研究發現，對於突破無家者的污名化現象，教育的效果有限，要扭轉社會大眾的偏見需要長期的努力，去改變潛在的社會價值觀。成功的日常生活實踐及戰術操作，不僅可以消除無家者的污名現象，同時也與社會產生互動。雖然國內已有若干探討弱勢者去污名化手法及方式的研究，然而並無針對無家者此一族群進行全面且長期的參與觀察研究。

本文運用污名及日常生活理論，採取質化研究取徑，以參與觀察法、文獻分析法、敘說分析法三大研究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發現，臺灣無家者日常生活實踐及戰術操作方式可分為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結合異己、下有對策、符號挪用、二度創作、敘事框架的轉化等六大戰術。本研究以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空間位置等三大效應，分析臺灣無家者的日常實踐及其戰術操作。這六大戰術除了運用多元的空間位置外，亦展示一定的主體能動性，以及無家者或多或少正向的轉變行為。

關鍵詞：日常生活理論、污名、無家者、戰術

壹、研究背景與動機

遊民又雅稱無家者、街友，指的是居無定所、棲息街頭的人。「無家者」一詞由 2010 年後成立的數個民間組織推廣使用，其定義包括了法令上的遊民、居住於收容單位，以及居住於不安全或不適當之住所者（許哲韡，2019）。臺灣無家者的問題被認為並不嚴重，無家者人口占比相較歐美地區來的低，但若比較文化與經濟發展軌跡類似的東亞國家，臺灣則明顯高出不少。臺灣狹義無家者人數占總人口比例約 1/7700，要高於韓國（1/25000）與日本（1/32000）（黃克先，2021 年 12 月 23 日）。事實上，再富裕繁榮的城市，也不可能讓無家者絕跡，但如果城市願意包容、接納他們的另類生活，無家者可以成為城市的另一種風景。現況是，無家者迫不得已走入公共場域生活，欲從大眾的公共空間中分得一點私人空間，這時無家者的私領域與公共空間將會重疊，成為一種共同在場的關係，因此招致排擠與排斥（許華孚、孔健中、黃千嘉、劉育偉，2014）。臺灣政府之所以無法對無家者採取積極且適切的作為，究其原因在於迎合整體社會保守氛圍，以及過往經濟發展模式所鞏固的想像，認為願意打拼就能出頭天，失敗者都是自己不夠努力與堅強。民意代表也往往在特定利益團體的政治動員和中間選民的考量下，發表帶有歧視的言論或方案（黃克先，2021 年 12 月 23 日）。

Goffman（1963）曾試圖以污名理論涵蓋各種文化偏見、歧視與刻板印象。他以精神病患的社會處境為基礎研究，指出污名就是身分的社會建構過程。Goffman 的理論不僅奠定污名研究的基礎，也啟發一連串以污名本質、來源與後果為主題的研究（羅彥傑，2018）。社會對部分議題的污名化，形塑成一種拒絕與歧視被污名者的社會文化環境，因此

被污名者的生活受到社會環境負面訊息與不健康心理等因素之影響（黎士鳴、何政岳，2009）。污名化問題與所處文化息息相關，東西方世界的思維根植於不同的文化觀點。西方世界著重自我的個體主義，東方世界則著重團體融合的集體主義（Kim, 1994）。在個體主義的文化下，受污名化的個體可以透過強化「自我成就」來擺脫污名化的影響，而在重視團體接納的集體主義文化，卻是需要「社會接納」來改善污名化的問題。在這樣社會接納需求高的文化脈絡，受污名化群體更是難以維持良好的心理健康，也更容易隱藏身分，以免遭受更多的社會排斥（Chaudoir & Fisher, 2010）。

研究者使用「街友」、「污名」這二個關鍵字進行 Google 搜尋，共出現 348 萬筆結果，顯示這二個字詞的連結度頗高。雖然無家者已是全球現象與議題，然而污名化卻是阻礙無家者管理的一大障礙。Corrigan, Larson, & Kuwabara（2010）將污名分成公眾污名化、自我污名化、避免標籤化三大層面。在公眾污名化部分，無家者會面對社會拒絕與排斥問題。在自我污名化部分，無家者會產生自我貶抑與低自尊問題。在避免標籤化部分，被污名對象如無家者會避免相關制度措施，導致管理上的漏洞（Riley & Baah-Odoom, 2010）。

由此可知，無論在無家者預防或管理上，無家者污名化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議題。透過當代漂泊協會、芒草心慈善協會、人生百味、浪人食堂、臺灣夢想城鄉協會等無家相關團體的努力，臺灣社會看待無家者與貧窮議題的方式，正逐漸改變。2021 年 5 月新冠肺炎本土案例爆發，萬華為感染重災區，雖然仍可見媒體與民代捕風捉影地暗示無家者為亂源，但也見到媒體主動採訪無家者及芒草心慈善協會，聆聽無家者的聲音，政府也出面譴責個別民眾對無家者的歧視行為（黃克先，2021 年 12 月 23 日）。然而，黃克先（2021）的研究也發現，在政府持續以福

利服務的方式來面對無家者問題的過程中，雖然投入的預算愈來愈多、提供的服務更加全面，但無家者只是被動接受方及實現公共政策的工具，本身並未參與其間或自我發聲，導致無家者社會福利工作僅處理立即或表層需求，並非深層的回應，以致無家者數量持續維持。這群人也因接受救助且看似遊手好閒，更加深他們在社會上的污名。

媒體污名化對無家者常常有著極大的負面影響，如何使弱勢者去除污名，重返主體，是相關研究及實務不可忽視的。過去研究發現，對於突破無家者的污名化現象，教育的效果有限（林芸萱，2015；黎士鳴、何政岳，2009），要扭轉社會大眾的偏見需要長期努力。無家者必須重新獲得與人溝通的社交能力，同時使社會大眾以正確的態度和無家者互動，並給予其自立更生的工作機會，才能使他們成為社會接納的一群。Goffman 曾說，「所有關於精神病人的專業文獻，都是採取精神科醫師的觀點，而這種觀點對社會而言，落在天平的另一端」（Goffman, 2017, p. 18）。那麼天平的其他一端會是什麼？各種單一觀點都可能產生視野的侷限性。雖然臺灣已有若干探討弱勢者去污名化手法及方式的研究，然而並未針對無家者此一族群進行全面、長期且以「無家者觀點」作為主體的參與觀察研究。根據以上研究動機，本文即以長期探討、分析無家者的日常生活實踐及戰術操作方式為主要研究目的，以期帶給無家相關群體及其他被污名對象反思與參考。

貳、文獻檢閱

一、無家者

無家者，廣義而言是指居住暫時性設施，或無法繳納房租、被都市

更新計畫驅離、因家暴離家而失去居住空間者。臺大社會所教授林萬億（2011）在〈街友 哀愁的社會邊緣人〉寫道，無家者大多因健康問題、物質濫用（酒精中毒、吸毒）、家庭暴力受害、被遺棄（老人、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和個人選擇等五種因素而成（林萬億，2011 年 1 月 31 日；轉引自吳象元，2015 年 4 月 2 日）。無家者背景多元，近來也發現高學歷者及年輕族群淪落街頭（徐敏雄，2018），可能因個人社會結構的不利經濟環境，以致失業過久無法返回主流勞動市場，又遇個人不適應因素或家庭關係薄弱無所依靠，最後只好流落街頭（鄭麗珍、張宏哲，2004）。根據過去研究及親身接觸經驗，許多無家者都有零工收入，收入多時雖可租房暫時脫離流浪生活，反之則又會重返街頭。無家者並非固定身分，而是一種流動的生活狀態，並且是反覆流浪、循環性很高的一種族群（王淑楨，2012；徐敏雄，2018）。

臺灣早期的無家者政策大多採取懲罰主義，處理方式以監禁管理、隔離為主（江瑩，2001）。1994 年，臺北市議會廢止了原本的《臺北市取締遊民辦法》，並通過《臺北市遊民輔導辦法》，讓無家者在政策上被犯罪化的情況消除。政府也在 1997 年修正《社會救助法》時，加入第 17 條，確立地方政府主管無家者的輔導業務，無家者漸被認為是有待社會福利幫助的可憐人群，需由社工提供其維生所需資源（黃克先，2021 年 12 月 23 日）。政策上更傾向擺脫以往警政主導下強制安置的色彩，強調「社政輔導」原則（同上引）。

大部分無家者亦會以主流社會的刻板印象看待自己，他們會努力隱匿自己，降低與他人互動，以保全自尊，這樣的情形也導致無家者持續削弱自我表達能力（徐敏雄，2018）。某些無家者將自己的落魄合理化為冒險行為，或自詡為脫離主流制約的反抗者，或採取特立獨行的生存策略（郭慧明，2004；Wasserman & Clair, 2010）。Goffman（1963）認

為有些無家者會將自身處境視為「是福不是禍，特別是把受苦看作可教導我們關於生命與人的道理」。有些無家者不提及或詢問各自往事，保護彼此隱私，亦有些無家者選擇責怪親友，或仍以主流價值數落其他無家者（吳秀琪，1995；郭慧明，2004；Karinshak, 1996）。臺灣無家者間少見團結的存在，更多的是彼此敵視或不信任，這種狀況與資本主義強調個人打拚出頭天的意識形態有關。能自食其力者，不但不願與同事有太多瓜葛，也與其他無家者做道德劃界（黃克先，2021）。

臺灣目前以緊急服務策略為本，安置輔導無家者，以維護他們生存權利，其作法集中在物資與醫療費用提供、臨時安置與租賃津貼等方案（黃克先，2021；鄭麗珍、張宏哲，2004；Daly, 1996; Doak, 2008; Wasserman & Clair, 2010）。其次為過渡服務策略，重點在於提供職業訓練、就業轉銜、申請福利身分、時間與財務管理、法務或債務問題處理、心理重建、自我表達、協助克服藥酒癮問題的身心治療及人際關係等（黃克先，2021；Daly, 1996; Karinshak, 1996）耗時更長的安置和處遇（陳自昌，1995；黃克先，2021；Doak, 2008）。最後為穩定服務策略，重點在於提供永久住處、長期諮商等（黃克先，2021），有助無家者穩定就業、復歸社區的舉措。

黃克先（2021）發現，基層官僚的無家者治理並非只服膺上意，也會在自身專業考量下，說服長官以案主長期利益為準，發展以下三策略：「橫向攤付」策略指的是基層官僚橫向聯結其他單位，將處理無家者事務的責任與其他單位共同分攤；「向下收編」策略指的是縱向的向下拉攏，意即以職務裁量權之便，漸進式的給予無家者資源以建立交換關係，以便在未來換取對方配合社工要求；「向上校準」策略指的是有些基層官僚之所以願意執行上級命令驅逐無家者，是試圖換取長官更長期支持他們專業考量下的計畫。

二、污名

污名 (stigma) 等同標籤化及恥辱，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特定團體及特殊疾病之現象，通常是與社會期待背道而馳時，人們所賦予的負向觀感。美國社會學家 Goffman (1963) 首次將污名從具體層次的標誌 (動物、奴隸身上的烙印) 衍生到抽象層次的社會身分表徵 (愛滋病毒感染者、精神病患)，Goffman 將受污名者分為「明顯受貶抑者」與「可能受貶抑者」二種，區別在於其具有的差異是否能輕易被察覺。Goffman (1963) 亦將污名區分為身體、個人特質與族類污名 (種族、國族與宗教等) 等三種型態。被污名化的個體或群體偏離社會主流規範，具有不受社會讚許或帶有不名譽之特徵，可能會導致身分受損，引發不平等對待。被污名者所感受的負面經驗，包括恥辱、責難、隱蔽、孤立、社會排除等 (邱郁茹、高淑芳，2012；Byrne, 2000)。甚至，隱喻污名化可能直接影響病人的就醫行為，危及性命。例如，某些癌症病患可能藉由隱喻瞭解他們所患疾病，不僅是致命而且是可恥的，變得洩氣而無希望 (邱玉蟬，2015)。

愛滋病 (黎士鳴、邱淑美、彭煒智、畢敦傑、許若魚，2010)、精神疾病 (林芸萱，2015；唐宜楨、陳心怡、吳慧菁、鄭詩蓉、高藝洳，2009；陳佳利，2014；陳依煜、連盈如，2015；管中祥，2018；羅彥傑，2018；Han, Chen, & Li, 2016)、性別、年齡 (邱郁茹、高淑芳，2012)、遊民 (許華孚等人，2014；管中祥，2011)、原住民 (林福岳，2012)、自殺者遺族 (陳增穎、顏原達，2019)、外籍新娘 (阮曉眉，2012)、性工作者 (陳美華，2008)、壽險業、憂鬱情緒 (張虹雯、王麗斐，2015)、口吃 (林峯全、簡欣瑜，2018)、智能障礙

（陳志軒，2018）、癩癩（王瑞賢，2015）等都是常見的被污名對象，亦有眾多學者投入此類研究並獲得豐碩成果。

社會人士普遍對無家者具有露宿街頭、無家可歸、製造髒亂、增加犯罪率、製造社會不安、傳染病防治死角、藥物濫用、貧窮等刻板印象（方孝鼎，2001；江瑩，2001）。部分民眾認為無家者衣衫襤褸、身體有異味、外貌不乾淨、行為不禮貌，讓人無法忍受，經常通報相關機構，希望將無家者強制安置或送醫（王淑楨，2012）。原已不屬於警政系統的無家者業務，就在「加強管理」的政治壓力後，重新被納入基層員警的勤務範圍（許華孚等人，2014）。臺灣社會對於無家者的污名化是一種結構性的問題，許華孚等人（2014）的研究發現，臺灣有一種譴責窮人的主流價值觀，認為貧窮是窮人自己的問題，無家者應該為自己招來貧窮負起責任。Corrigan & Lundin（2001；轉引自管中祥，2018）指出，大部分的民眾並沒有太多接近被污名者「經驗建構」的機會，反而大多來自「社會傳播污名化」，即傳統文化中的神話、傳說、風俗以及大眾傳播媒體的再現。污名造成無家者的身分地位被貶低，這些被到處驅趕的社會底層階級，必須在都市的荒廢區域或陰暗角落中躲躲藏藏。這些地區也驟然變成當地人眼中的「恐懼地景」，成為一般人害怕接近的區塊。另一方面，無家者不僅處境被邊緣化與被污名化，還經常成為犯罪被害人。污名對於無家者生存及自我認同造成的危害是全面性的。他們一方面因此難以取得維生所需資源，另一方面需花費許多精神運用策略對抗污名、維護自我尊嚴，使他們的謀生、社交與家庭生活更陷困難。例如，無家者以接受救助為恥而不願接近社會局或其他幫助網絡，在工作及生活上彼此瞧不起或嫌棄，而無法建立穩定的互助及情感支持關係。無家者生活所在區域，也常見鄰避效應，透過陳情、通報或自力驅趕等方式，限制許多無家者的生活機會（黃克先，2021年

12 月 23 日)。

大眾媒體眼中的無家者，經常等同於好吃懶做、暴力傷人、髒亂不堪的代名詞，被書寫的無家者卻少有自我表達的機會，只能被動地任憑污名產生（吳秀琪，1995；Daly, 1996）。唐宜楨等人（2009）建議，要處理無知所導致的污名化，可以針對特定的次團體／族群（如年齡、教育程度、宗教等），在社區內舉辦教育訓練。陳依煜、連盈如（2015）亦發現，大學生可透過教育介入改變其對被污名者的認知，進而影響對待被污名者的態度，最終影響與被污名者的社會距離。教育是透過廣告、書籍、傳單、電影電視或其他工具來提供被污名者的相關訊息，進而挑戰民眾心中對被污名者的誤解。實證研究也發現，透過教育可減少社會大眾對被污名者的負面態度（成和玲、余伍祥，1997；Holmes, Corrigan, Williams, Cancer, & Kubiak, 1999），其缺點是影響範圍有限，且無法立即引發行為改變（林沅萱，2015）。

黎士鳴與何政岳（2009）認為，光是具備正確的知識還不足以對抗污名。「偏見」是人們普遍存在的負面態度，並非僅靠教育就容易改變。要扭轉社會大眾的偏見需要長期努力，去改變潛在的社會價值觀。Corrigan & Penn（1999）提出倡議、接觸等兩種降低污名的策略。倡議指的是讓人們出於道德，考慮消除污名觀點，並針對大眾負面態度及影響提出反對意見。倡議通常以反對污名的公眾言論、媒體報導和廣告為工具，其缺點是對立方會因被視為錯誤而產生不舒服感。接觸指的是讓民眾與被污名者頻繁接觸，提供人們對於被污名族群重新分類的機會（林沅萱，2015）。黎士鳴等人（2010）曾發展一日自然人際互動方案，嘗試運用人際接觸活動（包含破冰、共餐、合作等活動）來降低思覺失調病患的自我污名（Han et al., 2016）。黎士鳴、何政岳（2009）也證實接觸個案是消除污名化的一種良好策略，其效果與接觸頻率、刻板

印象與社會距離也呈現顯著相關。然而，接觸比教育更難普及與推廣，且非常需要謹慎的安排和實施。

管中祥（2011）相信，「弱勢發聲」、「尊重差異」是民主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與條件。弱勢者在傳播過程的參與，使遭邊緣化的社會群體得以發聲，表達他們對既存現況的不滿與焦慮，同時也能更進一步的尋求解決方案。痛苦從個體體驗走向公共空間，自然離不開傳播，痛苦也是弱勢底層群眾進入公共空間的媒介。在政治權力不平等的結構下，底層「痛苦」激發的媒體同情和關切比較微弱、短暫和偶然。因媒體創造愈多同情，也就愈可能產生公眾的「同情疲勞」。再加上，與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相比，底層群眾較缺乏自我表達能力和資源，因此底層「痛苦」難以長久地留在公共空間，亦較難對底層保持持續的關注（袁光鋒，2017）。弱勢發聲未必只能透過另類媒體，戲劇、舞蹈、攝影等多樣的「文化行動」也是展現公民與弱勢聲音的其他媒介（Downing, 2001）。管中祥（2011）亦提到，近年越來越多團體採取街頭行動劇場、社區地圖製作與地方史書寫、紀實攝影和紀錄片、藝術創作、壁畫塗鴉、另類學校的文化傳遞、另類公共媒體與社區媒體經營，乃至網際網路文化戰術等文化行動，對抗既有的體制與價值。陳佳利（2014）曾選擇澳洲、英國與臺灣的五個展覽個案，探討其不同敘事角度與手法所再現的精神疾病。

Karinshak（1996）曾建議採用個人傳記書寫或故事敘說等多元策略，讓無家者想法有機會被聆聽，並找出適合他們貢獻社區的方法，協助其重返社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活泉之家亦採用會所模式，使會員回顧自身生命經驗，釐清與疾病的關係，並自我培力對外溝通，協助與其同受污名的弱勢者（管中祥，2018）。

三、日常生活理論

(一) de Certeau 的戰略與戰術觀及日常生活概念

對 Lefebvre & Levich (1987) 而言，現代性和日常性共同建構了一個穩固、深層的結構——當所有特別的、優越的、專業的、結構性的活動，都被挑出來分析之後，那些「剩下來的東西」就是日常生活。Buchanan (2000, p. 129) 認為 de Certeau 的日常生活實踐研究所著重的是實踐的形式，也就是這些實踐的運作特性是否清楚地被描述和表達出來。

de Certeau (1984) 將文化研究比擬為一種「戰爭學」分析，並將力量的展現分為戰略與戰術兩種。de Certeau 的戰略，指的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宰制，而與戰略相反的戰術，就是一種由下而上、狡猾或者是巧妙抵抗宰制的行動。de Certeau 認為，戰略是一種權力正確性的表現，它代表著合理。而與之相對的戰術「它成碎片狀地滲入進來，無法整體地把握這個空間，也無法遠離此空間……戰術由於自己不擁有空間，它便依賴於時間，細緻地捕捉機遇的翅膀……為了將事件轉變為機遇，它必需不斷地對它們進行加工。弱者必需不斷地借助強大的異己力量。當它將不同的要素組合到一起的有利時刻，這就有可能實現。」(de Certeau, 1984；轉引自吳哲維，2013，p. 18)

(二) 弱者行動對於權力結構的反抗實踐

丘忠融 (2012) 認為世界並沒有被政治經濟結構徹底宰制，積極的社會行動者也可以透過整合各種詮釋元素、理解日常生活的後設意涵與「接合」多元意見的方式，以創造新的社會價值與問題意識。

以戰術取得的勝利是「以時間換取空間」，這是指當人們採取戰術的實作方式，必須時時在邊緣尋找抵抗的機會，也無法在特定場所保有這些戰果。換言之，弱者必須時時尋求各種機會，以便將各種事件轉換為抵抗異化的力量（邱啟新，2015；de Certeau, 1984）。簡言之，有資本的生產者執行戰略，沒有資本的一般使用者執行戰術。

社會行動者在相對遠離政治、經濟權力的場域工作，並透過這個根據地來累積自身的論述與行動能量，以對抗社會中的各種宰制力量（例如長期推動媒體改革的團體「媒體改造學社」及「媒體觀察基金會」），即為戰略實踐的一種模式（丘忠融，2012）。Bennett, Segerberg, & Walker（2014）提出集體式及連結式兩種動員行動邏輯，以反抗權力結構。集體式行動以組織為資源動員中心，組織成員擁有與組織相同的集體身分／認同或政治訴求。連結式行動則充滿個人化行動特色，行動者可透過社群平臺及個人網絡傳播資訊，動員成本低，傳播速度快（張依萍，2021）。王淑楨（2012）亦提過無家者增強權能的概念，即並非他人可以給予，而是個人內在所自生與自發的力量。增強權能可從兩個管道著手，首先是幫助無家者裝備所需要的資源，其次是增進無家者在生活上的完整度，包括使其能夠學習自決、連結資源、權力掌控與操作。無家者從增強權能的過程中學習到各種技巧、知識與方法，挑戰權力結構（同上引）。

（三）行動的對抗是以逃避和迴避的細微動作來進行

弱者運用戰術，伺機且迂迴的滲入權力，使得顛覆權力的活動成為可能（de Certeau, 1984）。在一些細緻、不易引起過多察覺的細節上，針對壓制力量的權力鋒芒，運用一些巧妙的戰術，實施個人的、小集團的違規，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邏輯應用，從而取得一些局部性的

勝利，故 de Certeau 以「避讓但不逃離」的狀態來描述（de Certeau, 1984；轉引自劉興偉，2010）。林秀幸（2012）認為 de Certeau（1984）並不急著將日常生活過早定義成一種抵抗的文化政治，而是提出對日常生活的觀察，著重操作的邏輯。使用既有符號、象徵與結構，進行反規訓對規訓之翻轉，即所謂的挪用，亦可稱為 de Certeau 之日常創造力程式。這個程式也可說明為何在群體共構之下，Google 地標有了非地標的意義（吳筱玫，2016）。袁麗金（2020）則以深圳的 Running Man 粉絲團為例，試圖使用戰術、剿竊、遊擊戰等術語闡述受眾的二度創作。

de Certeau 與 Foucault 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尋求的不是 Foucault 的對抗模式，而是逃逸和迴避的細微動作（Buchanan, 2000）。de Certeau（1984；轉引自吳哲維，2013，p. 17）認為，「文化邏輯就像菜單，主體依所覺察的需要而從中挑選業已可行的行動。在主體採取這些行動並將之個人化的範圍內，這些行動組成一套技能。」。因此，de Certeau 的日常生活理論鼓勵相對弱勢的無家者使用逃逸和迴避的細微動作（戰術），取得局部的勝利。

（四）日常生活實踐戰術的效應

1. 主體能動性的展現

主體能動性指的是人的主觀意識和實踐活動對於客觀世界的反作用或能動作用。對行動面而言，日常生活實踐戰術不再將大眾視為毫無抵抗能力的，浸淫於錯誤意識的文化傻瓜，而是能夠細緻挖掘各種在地的、細緻的、日常生活中的抵抗實踐，將能動性還予行動者（Passavant, 2004, p. 4）。如 Counter Publics（2021, December 4）、Lefebvre（1971）與 de Certeau（1984）所描述的，日常生活像是一個圈套因而需要批判

與抵抗。作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行動者，消費者可以從閱讀、交談、安居、烹飪、行走等日常生活的文化實踐方式，反轉消費者的角色，使之成為「奇觀的偷窺者」，創造出來去自如的戰術（de Certeau, Giard, & Mayol, 1998）。人們在既有規則中重新善用材料且轉化，是高度運用的象徵，一種權衡的、協商的、即興的創作，類似手工藝的拼貼。De Certeau（1984；轉引自萬毓澤，2007）使用二度生產、完全不同種類的生產來形容這些對不同產品的使用方式。de Certeau（1984；轉引自吳筱玫，2016）以為，實踐要掌握的便是使用者如何依據自己的準則，在浩瀚的生產體系中選擇各種片斷素材，以編纂出各式經驗，此亦即日常實踐的「主體能動性的展現」。

2. 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

de Certeau（1984；轉引自張淑麗，2009）曾陷入「意圖謬誤」而不自覺，反而賦予日常生活實踐者超乎實踐當下的政治動機與反思能力，形成後續的個體轉變。徐敏雄（2018）發現，無家者導覽培力課程能透過導覽技巧示範、導覽活動的親身體驗、多元場所規則適應，以及學員和導覽員之新社會角色扮演，搭配師生和同儕間信任關係的支持，引發他們的印象整飾動機。讓無家者在較具安全感的氛圍下，持續調整既有的言行儀態，展現不同於以往流浪生涯的生活風格，亦為「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的展現。

3. 空間位置

de Certeau（1988；轉引自吳哲維，2013）認為個體透過實踐的展演，反而擁有自己的一塊空間，實踐並非硬碰硬對決或全盤接受，而是在其中走出另外一條屬於「他者」（相對於主流）的路線，並組成他者擁有的空間，此亦即日常生活實踐的「空間位置」面向。部分學者亦曾

以 de Certeau 日常生活理論為本，進行「空間位置」的相關研究。吳筱玫（2016）從戰略與戰術角度分析 Facebook 使用者之打卡實踐，並以地點、時間點、同行者、使用者四大面向，探討受訪者之打卡戰術。黃微容（2014）從 Guy Debord（1961）的奇觀與 de Certeau（1984）的日常生活理論出發，在神農街社區營造與海安路藝術造街案例分析中，探究都市奇觀依著地方社區運行的行動軌跡，析理城市政府與在地行動者如何使用文化工具生產或反制奇觀。

綜上所述，de Certeau（1984）認為的戰術是一種消失的、沉默的狀態，也是過去研究較少著墨的觀看視野。本研究將以「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空間位置」等三大效應，作為分析臺灣無家者日常實踐及其戰術操作的主要架構。

參、研究目的

本文主要分為以下兩大研究目的：

1. 探討臺灣無家者在日常生活實踐中的戰術操作方式。
2. 分析臺灣無家者的日常生活實踐戰術操作所產生的效應。

肆、研究方法

本文採取質化研究取徑，以參與觀察法、文獻分析法、敘說分析法三大研究方法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質性研究方法重視社會脈絡，強調若要瞭解社會意義，必需將社會行動放入社會情境中進行解讀。參與觀察法的目的是與一個特定人群（例如，一種宗教、職業、次文化群體或一個特定社群）及其行為，建立一種密切與親近的熟悉感，透過在這

個人群所自然生活的環境中，密集地參與他們的生活。由於研究者能夠對於該專門領域展現局內人的理解，觀察過程中不需要透過其他人的存在協助研究進程。同時場域當中的被觀察者，並不會因為研究者的出現而感到陌生與恐懼，影響日常行動舉止的變化。並且，由於觀察者本身即為參與者，因此較易與觀察對象維持關係，保持良好的互動與溝通（Douglas, 1976）。本文進行的是一種身處事件發生現場的實地觀察，由研究者進入一個自然環境中，對眼前隨機發生的事物，進行一種「非干擾式的觀察」。由於筆者長期關注無家者議題，以「完全觀察者」一名局外人的角色，進行大範圍觀察場域的探究與考察（如表 1）。進一步，筆者在參與多場無家者導覽、真人圖書館、無家者教師研習、募資計畫、用餐體驗等活動中，以「參與者——如觀察者」身分與相關人員進行互動。同時亦於參與觀察過程中加入適度的開放式訪談，取得更多第一手資料。本文參與觀察實行步驟為「決定研究場域」、「進入研究場域」、「建立良好關係」、「實地觀察工作概要」、「實地筆記和深度訪談紀錄過程」等。因為無家者的生活場域多半較為流動且不易接近，故作者選擇北部較有規模的無家者服務組織為參與觀察場域，對象即為相關活動中所接觸到之無家者。雖然作者參與田野的時間有時很片段且並不完整，然而作者藉由每次的參與觀察，學習到如何與無家者相處，並透過組織工作人員建立關係，甚至有部分無家者願意與作者交換社群媒體帳號，持續關注至今。作者在過程中透過誰（who）、什麼（what）、何時（when）、何地（where）、為什麼（why）以及如何（how）六大要素，進行有意識、詳細的紀錄，以便於過程中了解無家者日常生活戰術是如何建構與形成。

文獻分析法隱含著詮釋學的概念，即透過詮釋的循環，將「部分」理解與「整體」理解進行一種互文的對照。本文所進行分析的文獻包括

專業領域所出版的專書、期刊論文、研究報告、技術報告等技術性文獻，以及政府公報、機構報告、新聞報紙、雜誌報導、講座內容、私人信件、筆記、日記、手稿、日誌等非技術性文獻。

敘說分析是研究人們說故事的敘述邏輯方法學，其目的在分析瞭解敘說者如何賦予生活經驗條理及順序，使他們生命事件和行動變得有意義。研究者不僅將所聽到的故事、說辭、對話視為社會真相，亦是經驗的再次呈現（Riessman, 1993／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敘說者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組織、重整經驗，甚至賦予經驗不同的意義，呈現出來的是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認同與身分（Lieblich, Tuval-Mashiach, & Zilber, 1998）。敘說本身是一種包含講述者與聽者及其所處社會文化脈絡關係的社會建構。敘說者所建構的無家故事，同時也被文化所塑造。對無家者而言，流浪使他們面對許多不同情境的壓力，不論是在人際關係、社交互動或是工作職場上，皆有著交互纏繞的關係。由於敘說分析探究的是以敘說者的「事實建構」來檢視問題，亦即敘說者如何呈現、解釋其經驗，因此個人在敘說過程中已存在某些觀點，而賦予條理、次序，使其建構的事實變得更有意義。另外，研究者藉由參與觀察的檢視來呈現內容的一致性與確實性。研究者在資料歸納中將關注「成為無家者的原因，是什麼因緣使他們開始流浪」、「流浪之經歷，流浪的日常生活，無家者對生命的看法和與其他人的互動」、「努力重建人生的方向，無家者對自我的看法和社會的認同」等三大部分。

表 1：參與觀察資料一覽表

類型	街友	參與項目	參與時間	合作單位	參與觀察場域
街友導覽	A1	臺北城市散步： 社會學：《城市無間道：街頭生存學》	2016 年 8 月 7 日 16:00-18:30	拾樂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城市散步	萬華區
街友導覽	A2	街遊 Hidden Taipei： A2 流浪記	2016 年 8 月 13 日 19:00-21:30	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萬華區
街友導覽	A3	街遊 Hidden Taipei： 城中時光散步	2016 年 8 月 14 日 16:00-18:30	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城中區
街友導覽	A4	街遊 Hidden Taipei： 西門王的漲跌人生	2016 年 8 月 28 日 16:00-18:30	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西門町
線上真人圖書館	B1	漂遊的靈魂旅行者	2021 年 10 月 19 日 19:00-21:00	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Google Meet
線上真人圖書館	B2	正能量製造家 - B2 聊聊《對岸》	2021 年 10 月 28 日 19:00-21:00	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Google Meet
募資計畫	C1、C2	浪人食堂的街頭英雄行動	2021 年 6 月 22 日 - 7 月 13 日	浪人食堂	嘖嘖群眾集資平臺
募資計畫	C3、C4	《浪人食堂 X 福喜小客廳》服務經費集資計畫	2022 年 4 月	浪人食堂	嘖嘖群眾集資平臺
教師研習課程	D1、D2、 D3、D4、 D5、D5、 D6	無家者議題教材包	2021 年 7 月	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Butter 線上視訊軟體
教師研習課程	D7	《如果我是他—無家者的街頭講堂》線上教師研習課程	2021 年 8 月 21 日	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	Butter 線上視訊軟體
講座活動	E1、E2	桃園社企小聚 No.67 分享人：朱冠霖共同創辦人／人生百味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10 日 18:30-20:30	國立中央大學尤努斯社會企業中心／人生百味股份有限公司	Cisco Webex
用餐體驗	-	重修舊好用餐體驗	2022 年 6 月 23 日 13:00-14:30	人生百味股份有限公司	重修舊好餐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研究發現

一、臺灣無家者被污名化現況

近年來，臺灣逐漸茁壯成長為公民社會，開始對無家者議題有所回應。首先，關注無家者勞動權益的當代漂泊協會，屢屢召開記者會控訴政府或民代歧視無家者，並與臺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合作，觸發社會對無家者露宿人權的關注。它也關注地方政府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的修正，促成政府刪除或修改具歧視或爭議的法條，並組織無家者公開抗議，為自己的權益發聲。再者，由前公部門無家者社工集結而成的芒草心慈善協會成立。它除了從事傳統的無家者社會服務外，還著重與其他無家者服務團體及萬華在地社區的串聯，並與關注居住政策的崔媽媽基金會、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共同行動。芒草心慈善協會亦積極投入去除無家者污名的社會教育工作、創新就業方案研發，讓親身參與的社會大眾認識到無家者與流浪生活的真實樣貌（黃克先，2021 年 12 月 23 日）。

接著是以 318 學運為契機組成的人生百味，它專精於文化創意、話題製造、募集資源，尤其擅長吸引年輕族群，並聯結公部門資源打造無家者友善共融空間。最後，與教會合作的浪人食堂、臺灣夢想城鄉協會等社會團體，共同建構出一種不同於既有慈善基調，又不只是被動配合政府的新型態無家者支援網絡（黃克先，2021 年 12 月 23 日）。前無家者 A1 也提到臺灣社會這樣的轉變：

流浪漢在民國 50 年之前，叫乞丐。後來說法就愈來愈斯文，本來叫流浪漢，後來叫無業遊民，現在叫街友。差別在哪

裡？因為年代不同，社會福利制度完善與不完善的差別，他們的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就有所差別。（受觀察者 A1）

臺灣社會整體看待無家者仍然有「譴責窮人」的現象，許多人仍視他們為好吃懶做而自願流浪的偏差者。面對外界質疑，E2 反駁「你怎麼知道我沒做事，我絕對跟他說，不然這裡給你聞啊（指腋下，臺語），每次回來都有味道啊。有那個流汗的味道，不然你聞，那是真的啊」。就連圍繞著他們的幫助網絡，包括宗教、國家與善心人士，也可能在互動中傷害他們的尊嚴，並扭轉其自我認同。

有些社福單位就是會覺得你明明就有工作能力，你為什麼還要把自己搞得那麼爛。我小時候是被收養的啊，養母過世之後，養父就開始酗酒，酗酒之後就開始家暴，所以我很早就離開家裡出來工作。我國中肄業啊，就是沒有地方可以盥洗，每天髒兮兮的誰要雇用你。（受觀察者 C4）

公權力也會帶給無家者被污名的恥辱及責難感，前無家者 A3 說道：

你們會發現這裡弱勢朋友很少……有些朋友為了討生活，會在捷運站的角落賣大誌雜誌。有些員警還好，有些員警過來還是趕，即使我們就很安靜的在那裡賣雜誌，可是他們還是認為我們在妨害社會秩序。（受觀察者 A3）

多數的無家者也曾經歷孤立及社會排除的時刻，A3 回憶道：

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求助無門，甚至我養母也是講這些

「現在不方便」……就是拿一些說詞來推拖啦。那時臺北車站還沒改建的時候，我坐在臺北車站落地窗的地板上……其中有一個志工，看到我們一群人想要過來問候一下……就被後面一個師兄拉住，就說「不要去」。（受觀察者 A3）

就連工作表現也可能成為無家者被污名化的項目，當無家者請假或無故曠工，導致雇主不滿將其辭退，不僅加深雇主對無家者的負面印象，進而不願再雇用無家者。一次個人的工作失敗經歷，卻衍生出系統性的問題，包含無家群體日益被污名化，並加劇無家者就業轉介的困難度（羅靖華，2021）。無家者也常被視為「恐懼地景」，而隱蔽起來。前無家者 A1 說道：

在那時，無家者就睡在龍山寺裡面。民國 70 年為什麼會被趕出來，因為有些流浪漢啊，喝了酒之後會破壞古蹟，龍山寺就不給他們睡了。（受觀察者 A1）

綜上所述，雖有若干無家者服務組織持續的為去除臺灣無家者污名而努力，然而目前臺灣無家者仍存在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公權力、職場剝削等相關污名化現象。

二、臺灣無家者日常生活實踐及戰術操作方式

臺灣無家者在日常街頭生活中，大致是從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結合異己、下有對策、符號挪用、二度創作及敘事框架的轉化等六大戰術去面對社會文化、公權力、職場剝削等困境。

（一）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

按理說，無家者是沒有實體空間的一群人，然而他們透過日常生活實踐爭取了若干的「空間碎片」。這類碎片的特性是無家者無法完整擁有這個空間，也無法遠離此空間。無家者 A1 描述艋舺公園的無家者現況：

一袋一袋塑膠袋，包什麼東西呢？睡袋，睡覺用的睡袋，還有他個人的用品。只要看睡袋的數量，就知道真正晚上在這裡打地鋪的人有多少。你看每個睡袋都還有寫名字喔，寫號碼。睡袋是巧幫總部，梧州街萬華社服中心提供的。除了公部門允許的法定空間之外，他們也睡在露店市場。打烊之後，市場攤位會有個架子，上面有木板，他們就睡在上面。（受觀察者 A1）

在經過三水街菜市場時，A2 也回憶起過去：

我也曾在這裡住過十幾天！這裡的好處是不怕颱風下雨，只怕半夜蚊子擾人，街友們還會集資買蚊香。蚊香一點，蚊子就跑光光，可以一覺到天亮。（受觀察者 A2）

A2 也補充道：

以前每當菜市場打烊，攤商們總是會將攤位清洗得很乾淨……雖然空間不大，卻也足夠讓一名街友在那睡覺過夜，這樣小小的舉動，是專屬於老艋舺人的貼心和默契。近年來在菜市場過夜的街友已經很少了，大都聚集在艋舺公園。（受觀察者 A2）

臺北車站也是眾多無家者的聚集地，B1 描述自己在臺北車站的流浪生活：

剛開始，當然是被人家趕來趕去。我人也不熟，半個人也不認識。後來我認識我一個好朋友叫大帥，他就叫我睡在他旁邊。從此之後，我在北車才有一個固定的睡覺位子……因為清潔隊六點半就要來打掃衛生，我們一般六點就要起床，把自己的行李整理好。北車有一個專門放行李的地方，我們要把行李放在那裏，隨便亂丟的話，你的東西會被清潔隊清理掉。（受觀察者 B1）

B1 所提到臺北車站專門放行李的地方，在過去是沒有的，而且在 2017 年臺鐵甚至貼出公告，要將無家者沒有搬走的行李，移至東邊垃圾場旁堆放。這項措施引發人權團體關注與抗議，要求北市府和臺鐵協商，給予無家者一個安置的空間。十多位無家者跟著人權團體進行街頭抗爭，北市府社會局每個月召開一次會議進行討論，無家者終於爭取到這個擺放空間，這也是「空間碎片」戰術的成功案例之一（劉俐均、吳東祐，2017 年 11 月 8 日）。無家者在他們經濟比較寬裕的時候，還可以尋找其他的碎片空間。

等我多做幾天零工，身上有個三、五千塊就可以去住旅館。蝴蝶蘭旅社老闆娘是我朋友，我是她老主顧，因為我一住就是半年、一年，都住很長時間，我二十年前就在那裡住，她開很久了，後來因為租約到期才收起來。（受觀察者 A2）

始於 2019 年的「重修舊好」也是無家者「空間碎片」的一部分。

「重修舊好」是位於南陽街上的一家非典型簡餐店，臺北市社會局以「培力商店」概念委託營運。一方面提供無家者休憩、洗澡和洗滌衣物，另一方面接受民眾預約到店用餐與空間使用者進行交流互動（羅靖華，2021）。根據研究者至「重修舊好」用餐的體驗（2022年6月23日參與觀察紀錄），無家者可自在的在店裡休息聊天，交流可參加的各式活動及打工機會，甚至還規劃著一同公開討論店內事務的「重修班會」。一般情況下，無家者不太會主動與用餐者交流，但是在離開時，亦有無家者親切的向研究者說道「歡迎再來」。浪人食堂也在2021年底成立了餐食共用空間「福喜小客廳」，這個空間邀請無家者及其他弱勢夥伴一起整理及運送餐食物資。除了讓來到這裡的弱勢者有熱騰騰的餐食可以溫飽，也將資源外送到不便外出的身障朋友、長者家中。這裡也成為名副其實的「小客廳」，人們彼此分享人生，談生活甘苦（羅靖華，2021）。

（二）結合異己

弱者必需不斷地借助強大的外部力量，當無家者將不同的要素組合在一起的有利時刻，期望的轉變就有可能實現。2010年後，臺灣出現了許多從事倡議及創新行動服務的新興小型非營利組織，它們帶來眾多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羅靖華，2021），這樣的轉變也帶給無家者結合異己的好契機。

2014年起，人生百味每月至少組織一次成員、社會大眾和無家者一起共煮、吃飯聊天的「石頭湯方案」。人生百味這麼形容「走進城市的一角，看見的不只是某幾位無家者的生活瑣事，而是換個角度認識平常容易被遺漏、值得學習的生存智慧」，石頭湯方案的核心不在給予無家者飽餐一頓，而是成為社會大眾認識無家者和貧窮議題的橋樑（羅靖

華，2021）。對於無家者來說，有群年輕人固定出現和他們面對面聊天，也是種舒緩現狀的過程（許哲韡，2019）。

2020 年 3 月正式展開的「人生萬事屋」方案，由人生百味擔任業主和無家者之間的媒合橋樑，在評估業主工作委託後，透過每週開會時間將其分派給有意願從事該工作的無家者。「人生萬事屋」一來可以提供工作資訊，二來透過社工提前到工作地點場勘以及當日「伴工」，不僅可減少影響無家者上工的潛在阻礙因素，社工在伴工過程也能同時教導其如何更好地完成工作，確保工作質量，達到業主滿意和無家者「做中學」的雙重效果（羅靖華，2021）。「浪人食堂」則是慕哲人社成立的無家者培力就業商店，其主要販售炸物、飲料與文創商品等（許哲韡，2019）。無家者在「浪人食堂」工作，一晚薪水 800 元，平均一週工作三天，月薪接近一萬（受觀察者 C2）。

「結合異己」戰術的利弊得失，有時也是需要無家者自行評估的，如臺灣《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與無家者的合作爭議。根據《大誌雜誌》創辦人李取中的說法，《大誌雜誌》採用批發，而非聘用或拆成的方式和無家者合作。新加入的無家銷售員可獲得 10 本免費的《大誌雜誌》，之後以 1 本 50 元向大智文創購買雜誌，再以定價 100 元轉賣給民眾，進貨價與定價的 50 元價差就是無家者的銷售收入。因為無家者與《大誌雜誌》，如同商品批發商和零售商的關係，因此無家者在工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意外及風險，只能由勞工自行承擔。此外，無家者在街頭販賣雜誌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的規定，警方可以逕行驅離，或對行為人或其雇主處新臺幣 1200 元以上 2400 元以下罰鍰。然因《大誌雜誌》拒絕承認和無家銷售員的僱傭關係，以致所有罰單都只能由無家者自行吸收。平心而論，若不是弱勢族群沒有太多的選擇和議價能力，販賣《大誌雜誌》這份工作

的勞動條件並不算太好（徐沛然，2018年12月14日）。

（三）下有對策

針對沒有資本的一般使用者或弱勢者也常會施行巧妙的戰術，實施個人的、小範圍的違規，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邏輯應用。被污名者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有時也會採取小小的叛逆，將一些違規之處合理化。Goffman（1963）也提過，受污名者會因受污名程度與方式之不同，採取「朦混通關」或「掩飾」的個體應對方式，藉以在不同場合、面對不同對象適當地揭露自身訊息。前街友 B1 曾說過：

我們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所以也會賺一些旁門左道的錢，就好像說有人在收那些人頭，你要不要做？辦預付卡，一張二百塊錢，十張就二千，我也在做啊……道德感、責任心甚至羞恥心，會漸漸被消耗掉，不會去在乎妳身上行為所呈現的是什麼樣的樣貌。（受觀察者 B1）

B2 也曾提過在無家者群體中，常常存在的「人頭」問題。他說：

在臺北車站那邊，有人過來接觸，你的身份證借一下，我給你幾百塊一千塊。借一下他幹什麼你不知道，你目前最需要的就是金錢。流浪的人最欠缺的就是金錢，金錢的誘惑對他們是很大的。（受觀察者 B2）

在一次導覽中，A2 突然從口袋拿出手機說：「你們看，這支手機是我昨天剛跟他買的唷，3G 的，兩百塊」（陳如翎，2014年11月29日）。朋友沒說手機是哪裡來的，也許就像無家者在路邊擺的二手貨一樣，通常是「借來的」，但沒有人在乎這個問題，因為這就是他們生活

的方式（同上引）。

（四）符號挪用

臺灣無家者也學習使用既有的符號、象徵與結構，來進行所謂的挪用。前無家者 A2 就用「電力公司職員」代替「街友」或「流浪漢」的稱號。

事實上，大家都說街友、街友、流浪漢，我們不認為自己是流浪漢。美其名，我們是電力公司的職員，臺電公司的職員。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路邊晃來晃去，巡電線竿，算電火柱仔啦。因為過去 A2 本身也有酗酒的問題，他自稱為「ㄉㄠ、好酒感動天（臺語）協會」的會長。（受觀察者 A2）

這些稱呼除了帶有幽默色彩外，也是無家者對社會污名的小小反抗。許哲韋（2019）也提到《大誌雜誌》對相關符號的重視。他認為外界大多所謂的支持或憐憫，其實都削弱無家者擔任《大誌雜誌》販售員的工作價值。因此《大誌雜誌》不以街友或無家者來稱呼銷售員，而是希望作為銷售員的無家者能有更多自主權去決定如何工作。

在街上賣雜誌，不能說是完全合法的，但現實上有很多考量，在街上賣東西的人都有他們的需要……讓銷售員作為 vendor 是認為大家都應該對銷售負責，去挑戰社會上普遍的階級和價值判斷（許哲韋，2019）。

此外，《大誌雜誌》編輯部每個月也會針對特定銷售員進行採訪，反映無家者的心聲（許哲韋，2019）。

（五）二度創作

無家者也試圖使用無家議題進行「二度創作」，作為一種遊擊戰、剿竊及戰術。街頭導覽是無家議題二度創作的重要方案，「街遊」（Hidden Taipei）創辦人曾文勤認為，「街遊」的終極目標並非賦予所有無家者工作機會、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而是希望透過「街遊」建立起無家者與當地居民間的橋樑。透過導覽能改善人們對於無家者的刻板印象，甚至藉此建立無家者的自信與成就感，讓他們重返社會（張瀨文，2015年2月12日）。由於能夠成為導覽員的無家者非常有限，芒草心慈善協會於2016年推出室內版的「真人圖書館」，提供更多無家者參與的機會。「真人圖書館」起源於丹麥，讓不同的人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並讓聽眾透過對話和分享者互動，是一種使用「對話方式」的閱讀。一場「真人圖書館」由好幾位無家者接棒上陣，每位講者分享約15分鐘的個人故事，收入則是平均分享（朱冠綦，演講記錄，2022年5月10日）。2017年開始舉辦的「貧窮人的臺北」展覽，是臺灣目前唯一針對都市貧窮議題的大型策展行動。「貧窮人的臺北」文案寫道：

大臺北今天的光彩奪目，其實是百多年來，由南來北往的逐夢人、一無所有的人、底層勞工、移民、原住民與青年貧窮者，付出心血、貢獻勞力打造出來的結果。從某種角度來說，今天繁華的臺北，不單是成功的人、有錢人的臺北，也應該是挫折的人、貧窮人的臺北（風傳媒，無日期）。

受益於臺北市各組織的蓬勃發展，每年（NGO 組織發起的）「貧窮人的臺北」活動都能創作豐富的素材，並透過多媒體方式與觀眾互動。例如，松山文創園區和剝皮寮歷史街區所舉辦的實體展覽，結合電影放映、深夜遊行等方式，進行長達一個月的體驗活動和實境遊戲（許

哲韜，2019）。

始於 2015 年的「人生柑仔店」方案，源自於「人生百味」因緣際會與名設計師聶永真合作，鎖定街頭相對普遍的街賣商品口香糖進行改造。「人生柑仔店」透過優化街賣商品，一來提升街賣者業績，使他們生活品質獲得改善。二來將過往大眾和街賣者建立在同情上的不對等關係，逐漸轉為平等的買家與賣家關係（羅靖華，2021）。在當時有些民眾專程跑去跟街賣者購買這款限量版的飛壘口香糖，有無家者回饋說：「他做街賣做了大半輩子，第一次看到他面前有人要排隊購買，他覺得很風光」（朱冠霖，演講記錄，2022 年 5 月 10 日）。因為二度創作的「街頭泡泡糖」獲得市場熱烈迴響，後續「人生百味」亦展開其他產品的開發，例如與小農合作的果乾和玉蘭花香氛片等，並與現下廣受大眾歡迎的圖文插畫家合作推出文創商品吸引商機（同上引）。

「浪人食堂」於疫情期間在眾籌網站發起了「街頭英雄包」計畫，街頭英雄包的內容物有一杯「浪人食堂」的無糖蜜香紅茶、一顆吳爸獨家配方茶葉蛋、兩塊臺式馬卡龍及五片口罩。街頭英雄包將由「浪人食堂」的四名工作夥伴親手製作，一週五天、每天發送 120 份，到雙北市各個清潔隊、消防隊。在此一無家議題二度創作計畫中，將無家者從受助者轉變成助人者，並從相關工作中獲得自信與力量（浪人食堂，無日期）。

（六）敘事框架的轉化

重新書寫無家者相關符號、文本結構及敘事框架，亦為無家者日常生活實踐的有效戰術。「艋舺走撞街頭遊戲」是芒草心慈善協會所規劃的一個四小時活動，遊戲裡總共有九個無家者和二個社工角色，每個角色背後都有個真實人物，透過扮演這些不同類型的角色讓參加者體驗無

家者在生活中所面臨的困境。在這樣的遊戲中，將無家者的流浪故事以「第一人稱」視角做為新的敘事框架，讓參加者產生同理心，減少被污名的機會（社團法人臺灣芒草心慈善協會，現場參與觀察，2021年8月21日，見表1）。例如，無家者D3在描述其無家成因時，就容易讓參加者覺得雖然D3有點無知，但卻「情有可原」又「可悲」。

被資遣以後，我失業了很長一段時間，後來爸爸媽媽生病，我是長子又剛好有空，就擔下照顧爸爸媽媽的責任，直到他們過世。之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背後長了大疔子，疔子深到差一點點就能看到內臟。我那時候沒錢看醫生，也不懂什麼社會福利，就想說去監獄治病好了。所以我拿了一把冷凍調理刀去搶超商，但又不想嚇到跟傷害到別人，我就特地挑了一間沒什麼人的超商。我站在收銀臺那邊，跟店員講說「搶劫，報案」就站在那裡等員警來，等的時候店員還請了我一杯飲料。之後就被法官判三年半，進了監獄，在監獄裡面治好疔子出來後，卻因為家人不諒解，只好出來艋舺公園流浪。（受觀察者D3）

D1、D4 這二位無家者的流浪故事更可看出社會結構因素對個人流浪成因的影響。

我們公司是寫電腦小工具軟體的，後來因為被App取代，沒有人要買我們的產品，我們公司就倒閉了。我失業了一段時間，也有去找工作，但這行的變動實在太快了，哪間公司要一個技術過時、四十幾歲的工程師？每封履歷都石沉大海，我覺得我已經不被這世界需要了，我不知道活在世界上的意義到底

是什麼？當房東跟我說，叫我再不繳房租就搬出去時，我也覺得沒什麼，反正人生就是這樣，也沒什麼好失去的。睡外面就睡外面啊，不用擔心房租、生活費、醫藥費。（受觀察者 D4）

後來老了，手腳慢了，老闆就給偶十萬說：「D1 啊，不是我無情，實在是現在市道很壞利潤很薄，沒辦法再請你啦。這是加減一點心意，你自己也要保重」。偶想想也不好為難老闆，拿了十萬就離開了。沒工作之後，偶就撿回收加減補貼，還好偶沒成家，一人吃飽、全家吃飽。你問偶有沒有家人喔？偶還有一個開計程車的弟弟啊，他也是手頭緊又有自己家裡要顧，偶這個做哥哥幫不了忙怎麼好再去叨擾。後來十萬用完了，撿回收也湊不出房租，又聽人家說萬華龍山寺這經常有善心人士來發便當，工作的機會很多，偶就坐火車來這裡，結果一待就五年啦！（受觀察者 D1）

在「艋舺走撞街頭遊戲」反思引導的過程，志工會引導參加者將遊戲中各種複雜的情緒和真實無家者的生活經驗結合，讓大家也能夠體會到有些看似不聰明的決定，當自己身在那個情境時，也有可能做出相同的事。例如，當自己怎麼努力都無法達標時，一些本來不會考慮的選項（賣人頭、全部的錢拿去簽六合彩等等）都會成為最後一搏的選擇。在經過到處東奔西走為生活忙碌的遊戲後，大家更能同理無家者導師的生命故事，而且他們真實的人生比遊戲裡的更苦。

臺北市所有的無家者相關民間組織中，《大誌雜誌》是唯一完全站在營利事業的角度，不領取補助，只接受少量捐助的組織。作為一本與無家者相關的媒體，一方面它連結特定品味的消費者，讓消費者持續認

知到無家者（或更廣義的貧窮）這樣狀態的存在，並帶給作為銷售員的無家者現金收入，是其模式所具有的功能，當然《大誌雜誌》也會以與一般不同的敘事框架來選擇或書寫所刊登的內容（許哲韡，2019）。

陸、臺灣無家者日常生活實踐及戰術操作效應分析

本研究分析臺灣地區無家者的日常實踐及其戰術操作效應，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日常實踐及其戰術操作效應分析

日常實踐及其戰術操作方式	日常實踐戰術操作的效應三大面向		
	主體能動性的展現	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	空間位置
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	兩極化	安定需求、交誼需求	多元、正式／非正式、公務／休閒、管制／隨意
結合異己	主動性弱、能動性強	對話機會、就業機會	點、線、面
下有對策	主動性強烈	發泄後繼續生活	街頭
符號挪用	因人而異	反自我污名	不特定
二度創作	主動性弱、能動性強	自信建立、影響機會 就業機會、助人議題	點
敘事框架的轉化	主動性弱、能動性強	對話機會、影響機會	點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主體能動性的展現

主體能動性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們能動地認識客觀世界；二是在認識的指導下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表 2 中的「主動性」表示的是無家者對日常實踐及其戰術的意願主動度，「能動性」則表示無家者在給定環境中行動的能力，「強弱」代表的是程度的高低。「兩極化」指的則是此戰術呈現極不一致的狀況，有些個案主體能動性極強，有的極弱。「因人而異」指的即是因無家者性格、生長環境不同，對該戰術的應用較難統一化。

在「結合異己」、「二度創作」、「敘事框架的轉化」戰術部分，因這些戰術較無法由無家者自行發動，所以主動性弱，但這些戰術產生的效果相當卓越且能充分展現無家者能力，故能動性強。前街友王明俊也提到他在「二度創作」戰術中配合主辦單位說出自己流浪故事的心得。

風光的過去是王明俊現在的資產，他不無感傷地說，「我現在也是大人物，很多人要來訪問我，我需要生活費，就只好出賣自己，把我的過去拿出來賣（講自己的人生故事）」（鍾岳明，2017 年 5 月 29 日 a）。

在「二度創作」戰術部分，「人生柑仔店」計畫希望重新詮釋街賣，達到「透明分潤」的目的，讓街賣成為社會保護網的一部分。「人生柑仔店」的每件商品都會清楚標示其售價收入，是如何分配給街賣者、生產者及「人生百味」的，例如「商品所得，生產者取得 50%，街賣者取得 30%，剩餘作為人生百味團隊營運用」，希望讓社會思考剝削

與合理收入的差異（人生百味，無日期）。

在「下有對策」戰術方面，因其操作方式多半符合無家者己身需求，故其主體能動性較為強烈。在「符號挪用」戰術部分，因不是每一位無家者都在意符號象徵的意涵，故其主體能動性主要特徵因人而異。例如，無家者謝仁星在採訪時即表達他對既定符號的強烈不滿，「不要把我當流浪漢，我是因為環境才會墮落到這裡，把我當流浪漢對我不尊重，我在國外讀到碩士，怎麼可以這樣對我」（鍾岳明，2017年5月29日 b）。在「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戰術部分，主體能動性呈現兩極化現象。一方面，跟無家者相關的空間碎片有很多是由主管機關或無家者相關機構所管制的，無家者需依照它們的規章行事。從另一方面來看，既然他們為無家者，當然也有一定的自由逃脫這些束縛，進而尋找個人獨有的空間碎片。無家者謝仁星在一開始選擇自主性很強的空間碎片，之後才投入體制下的空間碎片。

謝仁星表示「這是很現實的社會，你沒利用價值就在街頭」。最初睡板橋車站，那時沒捷運，還有地方睡，後來到大安森林公園，再流浪到臺北車站地下停車場，睡了好幾年（鍾岳明，2017年5月29日 b）。

二、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

在「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戰術部分，無家者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為滿足安定需求、交誼需求。過去的無家者 C2（壹電視 NEWS，2020年12月19日）說：

因為我也在外面流浪過，我也撿過垃圾桶的東西吃，這也

沒什麼……我不想再回到街頭了。（受觀察者 C2）

另一名無家者 C1（55 歲，露宿街頭十多年）也認為：

會覺得說好像被社會層遺棄掉，便當來了，人人搶。人家愛給妳就給妳，不給妳，妳就一樣都拿不到……所以還是覺得有工作會比較好啦，妳工作至少自己的錢。（受觀察者 C1）

在「結合異己」戰術部分，無家者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為增加對話機會及就業機會。浪人食堂老闆余思賢說道：

確實很多很想站起來的無家者，而且當他們有機會的時候，他抓的比別人還緊……雖然說大部分的無家者都有工作，但是他大部分做的工作都是比方說舉牌、派報、工地粗工……這樣的工作不僅沒有保障且不穩定……有時遇到一段時間的工作低潮期，他自己會去算，我做的業績那些利潤根本沒辦法付他的薪水。他會主動跟我們說，我是不是這幾天先不要領薪水。（受觀察者 C2）

2021 年五月，臺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宣佈疫情三級警戒後，夜市、餐飲業無不受到衝擊，「浪人食堂」也不例外。

我實在很想快點回去出攤。在「浪人食堂」工作除了可以賺錢（C1 正在存錢租房子），我的生活也比較有重心，我知道今天起來要幹什麼，而且也有人可以講話。跟客人聊天啊，大家還會鼓勵我要好好工作，我覺得很高興，大家看見我這個人，有名有姓的 C1，不是「街友」，C1 眼睛亮亮地說。（受

觀察者 C1)

前無家者 D7 也曾受合作單位「芒草心慈善協會」巨大影響而轉變。

當時沒有想要離開，過一天算一天。所以我很感謝芒草心，那時候的想法是住幾個月，之後又要搬出去，又要回到街上去了，我沒有想到改變這麼大，我自己也很驚訝。在我當街友的那個階段，也不會想到現在會有一個穩定的生活。（受觀察者 D7)

在「下有對策」戰術部分，無家者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為發泄後繼續生活。當然時間久了，無家者也可能產生對違規態度的轉變。前無家者 A2 談到與蝴蝶蘭旅社老闆借錢的故事：

我跟她拿錢拿到她怕到了，她看到是我，就會說「A2 先生，那個要債的又來了」非常非常多……我現在已經完全不喝酒，已經四年多。（受觀察者 A2)

在「符號挪用」戰術部分，無家者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為反自我污名。在「二度創作」戰術部分，無家者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為自信建立、影響機會、就業機會以及助人議題。A1 身為亞洲第一個無家者導覽員，2015 年還曾幫臺大校長楊泮池及二十多位臺大 EMBA 校友會成員進行導覽，走訪隱密小巷，聽他融合生命經驗、大稻埕在地人文，講述艋舺的獨特三味：老人、街友及情色文化（張瀞文，2015 年 2 月 12 日；賴若函，2015 年 2 月 5 日；Chen, 2015, June 23）。A3 認為，他在導覽途中可以穿插介紹自己的故事及觀感，輸出自己的立場及思想。雖

然有些想法或許會讓人覺得「反社會」，不過以他們不同的生命經歷，可能會生成與眾不同的思想（受觀察者 A3）。街頭導覽除了可以提昇無家者的自信之外，也會增加其對無家者污名議題的影響力。例如，A3 在導覽途中說道：「今天天氣很炎熱，走了二小時，看到有些人不想走，我看到大家表情，不過我必需把我工作做到完。」這樣的說詞容易讓參加者對無家者的工作態度產生好感。朱冠綦也說到無家者的其他助人行為，在有一次社會局媒合的打掃過程中，有一位大哥說，「我不要領今天的薪水，那個弱勢戶實在太可憐了，我今天想要用當志工的心情來幫助這家人」（朱冠綦，演講紀錄，2022 年 5 月 10 日）。「浪人食堂」的弱勢工作夥伴 C3 也曾開心地說：「在『小客廳』工作，可以幫到跟自己一樣的人，真的很開心。如果能在這邊繼續工作，我也想要變得勇敢。」

在「敘事框架的轉化」戰術部分，無家者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願意去把握對話機會及影響機會。

謝仁星認為，我的人生還是在修行，因為我們要懂得適應，我們的需求跟社會提供給你的東西。你不能說我要這個我要那個，我要去出一本書，講一個故事，完整的故事是我是怎麼樣走過我的人生。從臺灣移民到巴西，然後從巴西回來臺灣（鍾岳明，2017 年 5 月 29 日 b）。

無家者在經過整體戰術洗禮後，還有一項重要的無家者個體轉變行為為即為同理其他被污名者，例如 A1 及 A3。

因為道德的不同，可能對這些女生有不同說法。有些人會說「這些女生好可惜」，有些人會說「這些女生好下賤，是賣

肉的」。以我個人觀點，我會覺得人的社會地位雖然會有高低之分，可是人格不應該有貴賤之別。（受觀察者 A1）

所以後來我也去參加像樂生……社會行動。這些行動我就去敲敲邊鼓。後來就有些記者發現到我……有些獨立媒體的報導會有幫助，不過一些主流媒體，我被採訪過，但是最後報導出來的是，它整個不是很詳實的報導。（受觀察者 A3）

三、空間位置

點線面的概念源於幾何學，點構成線，線構成面，是平面空間的基本元素。點是幾何中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在此表述的「點」是由單一事件或活動所形成的空間位置。線是點運動的軌跡，又是面運動的起點，在此表述的「線」是具有系統性或結構化但不定時可擁有的空間位置。擴大的點、封閉的線、密集的点和線都能形成面，在此表述的「面」是具有系統性或結構化且天天可擁有的空間位置。

在「二度創作」、「敘事框架的轉化」戰術部分，因為較多單一事件或活動，所以其空間位置都是以「點」為主。在「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戰術部分，空間位置呈現的樣態是多元的，包括正式／非正式、公務／休閒、管制／隨意等各種模式。在正式、公務及管制的部分，艋舺公園是典型代表。

走進龍山寺旁的艋舺公園，長椅上擺放各種食物與衣物，街友們在紙板鋪成的小區塊或坐或躺，一瞬間好像從臺北跳進另一個世界。A2 稱這裡是「艋舺動物園」，表示公園裡自成的文化圈常常引起旁人的好奇駐足。「你們看那椅子上一個紅

袋子，就代表一個人」如果 A2 不說，平常人可能不會在眾多雜亂的物品中特別去注意這紅色袋子，這是市政府配給的睡袋，一人一個（陳如翎，2014 年 11 月 29 日；陳歆怡，2015 年 7 月）。

在非正式、休閒、隨意的部分，很多無者家也有強烈的自我意識。

政府有沒有人來幫？有呀，有很多員警社工都有來過啊。只是他們都說我瘋了，要我去別的地方住。可是我不想去啊，我在這裡住的好好的！我以前有去收容所睡過，要去跟很多人一起住很不方便，還會一直吵架，我之前還有和人打起來。那裡規定又很多，所以我不想去。（受觀察者 D2）

在「結合異己」戰術部分，其空間位置包含點、線、面三種類型，E1 描述他的一天。

早上可能來重修這邊盥洗一下吧，中午就看有沒有工作，有工作就去工作，沒工作就是在重修這邊睡覺，然後晚上，等到時間到的話，就去網咖那邊玩個小遊戲，之後還是睡覺。（受觀察者 E1）

像「重修舊好」這種固定的空間位置就屬於「面」的一種。創世基金會的無家者餐食服務也屬於其中的一環。

它有固定吃飯時間，中午 11 點開始，魚貫下去，簽了名之後保障你有一碗飯，他們打飯都打好了，吃不夠的再裝飯。11：30 開始吃飯，叫到名字，出去拿飯菜、筷子，先簽的人先

拿，吃飽了之後把碗筷歸位。中午吃飽了，下午再來。下午四點簽名，4：30 開飯。（受觀察者 A2）

若是每年固定舉辦的活動就屬於「線」的一種，如 A2 說的：

如果我們過年想喝酒，要去哪裡呢？刈包吉的街友除夕圍爐。他中午煮，下午四點開門，大家去簽名，先簽的人就先吃，一次四十個人。上樓洗碗筷喔，後面的人才得有得吃。他頂樓有洗澡間，你要洗澡也可以啦，也有洗衣機，提供洗衣粉，可以把衣服洗好曬乾，明天再來拿。（受觀察者 A2）

零星類的活動則是屬於「點」的一種。在「符號挪用」戰術部分，空間位置並不特定。在「下有對策」戰術部分，多半都是違規的，所以發生的空間位置多半在街頭。

柒、結論

戰術的施行必定透過「行動」，無家者及其合作組織的行動路徑已達到 de Certeau（1988）所指一個說話者雖從語言中選取一定的字彙與文法，但卻創造出專屬自己的「發言」形式。臺灣無家者日常生活實踐及戰術操作方式可分為「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結合異己」、「下有對策」、「符號挪用」、「二度創作」、「敘事框架的轉化」等六大戰術。他們迴避固定路徑外，透過對其他路徑的自由選取挪用打破規則，零星而敏銳的戰術已取得相當的成功。在此撤退、進駐、聚集的位置上，臺灣無家者為自己爭取自治特區，一個將他者地點挪為己用的場所，一個空間的遊擊戰。以上由日常生活理論所歸納出來的戰術亦與

Goffman (1963, p. 9-12) 所提出受污名者的幾種回應情境方式有相似及對應之處，例如「空間碎片的爭取與占用」戰術是「直接矯正他視為缺點的客觀基礎」的一種手法。部分「二度創作」戰術可使得無家者「透過污名來獲得好處」。「敘事框架的轉化」戰術可使無家者「反過來評估與自身不同的常人，也存在了一些限制」。「結合異己」戰術則能協助無家者「刻意從事某些他人認為他不易從事的活動」。

本研究以「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空間位置」等三大效應，分析臺灣無家者的日常實踐及其戰術操作。這些戰術由日常生活中操演展開實踐，無家者閃脫「策略」運作，「戰術」自成一格。其硬將火力長驅直入至日常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細節裡，無家者反向進行日常生活由下而上的合作與改變。前無家者 D7 曾提過：

無家者難以接受的、最難過的不是物質上的難……最難過的是生活上的衝擊，以及自己放棄自己。（受觀察者 D7）

無家者透過對日常生活事件展演規劃，藉由數不清的動作，組合成自身的體系。這六大戰術除了運用多元的空間位置外，亦展示一定的主體能動性及對無家者或多或少的正向轉變行為。本研究觀察「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空間位置」之間的關係發現，主動性弱的「主體能動性的展現」戰術（結合異己、二度創作、敘事框架的轉化），在「空間位置」部分，多採「點」狀，以打遊擊的方式進行，然因其能動性展現強，「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效果反倒是好的，較剩餘戰術更多世俗、主流的轉變（就業機會、影響機會）。Goffman (2017, p. 310) 曾提起對自我的洞見「我們身為一個人的感受，來自於自己被捲入更大的社會單位；我們的自我感來自於我們抗拒拉扯的各種微小途徑」。在 Goffman 的架構下，無家者的自我建立即是

不斷和外在互動遞嬗而成。

de Certeau (1984) 日常生活理論著重的是操作邏輯或使用過程，本研究則更著重台灣無家者利用日常生活實踐戰術所謀取的「空間位置」。de Certeau 的「空間位置」指的不僅僅是實體空間，亦有 Goffman (1959) 「有界區域」的概念。Goffman 採取舞臺演出衍伸而來的戲劇表演觀點，來檢視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Goffman (1959, pp. 31-63) 認為「空間位置」包含「特定表演正在進行或可能進行的前臺區域」、「與表演相關但呈現不一致外觀的後臺區域」，以及「二個區域之外的剩餘區域」。臺灣無家者（劇班）呈現了「被社會化」的表演，並依此來塑造、修改，以適應社會理解和期待，進行「印象管理」。「劇班」指的是個體可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組成一行為群體，採取各種可能手法，以推進他們的共同利益。「劇班」與其他「劇班」的互動就形成了「劇班印象」。無家者「劇班」成員的動機、能力、個性、集體意識、團體動力、目標共識等因素都可能影響其「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及「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這樣的分析筆法將個人與群體細膩地交纏在一起，具體地展現社會與結構如何在個人互動中逐漸成形的過程。臺灣無家者亦嘗試在前臺、後臺空間外，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剩餘區域」。

本研究發現，de Certeau (1984) 認為使用戰術必須時時在邊緣尋找抵抗的機會，也無法在特定場所保有這些戰果的觀點並非完全正確。被污名者如無家者由日常生活實踐戰術（由下而上）取得的勝利，似乎也可能影響有資本的生產者去發展另一戰略（由上而下），便也可能成為「穩定的空間」（正式、公務、管制、面），故沒有資本的一般使用者也非一定需要時時刻刻的抵抗。先前日常生活理論似乎忽略運用成功戰術「滲入權力」後的相關影響作用，根據李艷紅、楊梵（2013）的研究，藝術家的文化資本能構成抗爭行動成功表達自身話語的重要載體和

條件。透過媒體近用，在公共話語空間獲得更高的文化資本、傳播賦權與「藝術家」都市空間抗爭顯著度，成功實現了共識動員。相對的，文化資本較低的無家者，更需要透過「增強權能」的過程，與有資本者結盟，產生更大的「去污名」影響效果。

Goffman (2017, p. 17) 曾說：

我相信任何一群人——囚犯、原始人、飛行員或病人——都會發展出他們自己的生活，一旦你接近它，就會變得有意義、合理和正常。此外，若想要瞭解這些世界，一個好的方式是讓自己與那些成員為伍，去體驗他們由各種瑣碎的偶發事件所串起的日常生活。

本研究以深入接近無家者為宗旨，為其日常生活戰術找出意義，此為本研究第一個研究貢獻。其次，過去日常生活理論多以文字論述為主，較無結構性的分析架構。本研究試圖以「主體能動性的展現」、「個體轉變的行為傾向」、「空間位置」三效應做為分析主體，討論其互動性，此為本研究第二個研究貢獻。再者，本研究結合 de Certeau (1984) 日常生活理論及 Goffman (2017) 污名理論共同分析，得知「主體能動性的展現」亦可能是 Goffman 的前臺表演，並重新印證「並非認為權力不重要或不具影響，而是難以離開日常生活來表現」等個體日常自我表演的概念 (Goffman, 2017)。同時藉由本研究對臺灣無家者共同在場和遭遇的描述，也補足了原 Goffman 研究中欠缺對「他所描述的機制如何進入人類並內化」的理解，此為本研究第三個研究貢獻。

最後，研究者提出以下三點檢討與建議。第一、本篇論文歷經六年時間進行參與觀察，而在後二年因為疫情因素，許多觀察場域僅能在線上進行，無法充分觀察細節，甚為可惜，此亦為本研究疏漏之處。第

二、因無家者相關輔導機構皆不建議研究者自行接觸無家者，故本文所接觸的無家者多半都為「前無家者」亦為「成功」脫離流浪生活的無家人士。雖然這些「成功的無家者」對於無家者的日常實踐及其戰術操作可能會較為熟稔，但他們的觀點或許會與其他無家者有所不同。再加上，研究中的無家者大多是配合組織機構活動參與當中，是否會因此維持既有霸權的敘事框架？亦值得細究。建議未來研究者可針對此點，再進一步思考更佳的田野調查方式。第三、本文的主要研究場域，偏向北部。雖然北部的無家者日常實踐及其戰術操作可能較為精彩，然而有所偏頗，故建議未來研究者或可向臺灣中南部無家者及相關組織進行調研，或可得出更完整的研究結論。

根據作者自身的經驗觀察，臺灣無家者現況大致與理論架構相符合，然而是否大多數無家者都願意採取相關的日常生活實踐戰術，來挑戰臺灣社會施加於他們身上的污名，非本篇研究可準確得知。再者，這六大戰術也可能對去除意識形態、社會文化、公權力、職場剝削等各項無家者污名還無法產生非常顯著的效果。或許有部分大眾會對無家者「劇班」成員的不夠積極產生「個體責備論」，然而去除污名本來就不應該是只有「被污名者」才需要努力的事情，政府、民眾對個體的尊重及「反污名」共識的建立，才是總體應持續進行的社會改革。

參考書目

- 人生百味（無日期）。〈人生柑仔店〉，《人生百味》。上網日期：2022年9月24日，取自 <https://doyouaflavor.tw/ripplemakerinthestreet/>
- 方孝鼎（2001）。《臺灣底層階級研究：以臺中市街友、拾荒者、原住民勞工、外籍勞工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研究所博士論文。
- 王勇智、鄧明宇譯（2003）。《敘說分析》。臺北市：五南。（原書 Riessman, C.

- K. [1993]. *Narr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Boston, MA: Sage Publications.)
- 王淑楨 (2012)。〈街友社會工作之現況、困境與因應策略之探討：以臺北市為例〉，《聯合勸募論壇》，1: 25-58。
- 王瑞賢 (2015)。〈終結癲癇的污名？癲癇團體面臨的挑戰〉，《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3(2): 137-175。
- 丘忠融 (2012)。〈「生活世界殖民化」下的社會行動者角色〉，《玄奘資訊傳播學報》，9: 219-241。
- 成和玲、余伍祥 (1997)。〈五專護生對精神病患概念及態度之改變——精神科護理教學評值〉，《公共衛生》，24(3): 193-202。
- 江瑩 (2001)。《從大臺北地區之遊民服務網絡探討遊民賦權之可行性》。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艷紅、楊梵 (2013)。〈文化資本、傳播賦權與「藝術家」都市空間抗爭：對 J 市藝術區拆遷集體維權行動的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26: 33-73。
- 吳秀琪 (1995)。《底層的社會建構與自我認同——以臺北市遊民為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哲維 (2013)。《沉默的戰術——一位儲備教師生命歷程的自我日常生活實踐敘說》。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 吳象元 (2015 年 4 月 2 日)。〈你所不知道的街友：他們總是想辦法活下去一點小事就能很開心〉，《關鍵評論》。取自 <http://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780>
- 吳筱玫 (2016)。〈網上行走：Facebook 使用者之打卡戰術與地標實踐〉，《新聞學研究》，126: 93-131。
- 阮曉眉 (2012)。〈功能分化社會的涵括與排除機制：以臺灣「外籍新娘」為例〉，《社會分析》，4: 1-43。
- 林沅萱 (2015)。〈由華人的面子問題探討精神病患的污名〉，《耕莘學報》，13: 5-12。
- 林秀幸 (2012)。〈縫隙中的抉擇：地方與國家交鋒下的象徵建構〉，《臺灣社會學刊》，49: 103-146。
- 林峯全、簡欣瑜 (2018)。〈口吃污名化之探討與省思〉，《溝通障礙教育》，5(2): 25-37。
- 林萬億 (1995)。《遊民問題之調查分析》(研究報告出版編號：研考 II-1260)。臺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林福岳 (2012)。〈主體性的呈現，傳播權的實踐——臺灣原住民族自主傳播的發展歷程〉，《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11: 1-24。
- 邱玉蟬 (2015)。〈寫劇本或新聞？看熱鬧還是感同身受？女性癌症病人的新聞建

- 構》，《傳播與社會學刊》，31: 65-94。
- 邱郁茹、高淑芳（2012）。〈高齡未婚女性污名化與去污名化之探討〉，《諮商與輔導》，320: 16-19。
- 邱啟新（2015）。〈「朗讀違章」與「建構蘭花屋」：當代臺灣違建論述之公共空間觀點與公共性詮釋〉，《建築與規劃學報》，16(1): 21-39。
- 林萬億（2011年1月31日）。〈街友 哀愁的社會邊緣人〉，《玉山周報》。取自 <https://city.udn.com/54543/4479036>
- 風傳媒（無日期）。〈貧窮人的台北〉，《風傳媒》。上網日期：2022年12月20日，取自 <https://www.storm.mg/public/thepoor>
- 袁光鋒（2017）。〈感受他人的「痛苦」：「底層」痛苦、公共表達與「同情」的政治〉，《傳播與社會學刊》，40: 203-236。
- 袁麗金（2020）。〈社會勞動視野下網路粉絲群體的形成與沒落：以 Running Man 粉絲團為例〉，《傳播文化與政治》，12: 63-101。
- 唐宜楨、陳心怡、吳慧菁、鄭詩蓉、高藝洳（2009）。〈身心障礙污名認知與污名主觀經驗——以精神疾病患者及脊髓損傷者為例〉，《身心障礙研究季刊》，7(4): 230-244。
- 徐沛然（2018年12月14日）。〈是幫助還是利用街友？破解《大誌》的社企神話〉，《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s://ubrand.udn.com/ubrand/story/12117/3537095>
- 徐敏雄（2018）。〈從街友到導覽員：萬華經濟弱勢者培力課程實踐歷程的個案分析〉，《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14(2): 1-33。
- 浪人食堂（無日期）。〈浪人食堂的街頭英雄行動〉，《嘖嘖群眾集資平臺》。上網日期：2021年10月22日，取自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wanderes-table>
- 黃克先（2021）。〈臺灣遊民社會福利體制的運作及效果：從基層官僚治理取徑切入〉，《臺灣社會學》，41: 51-94。
- 黃克先（2021年12月23日）。〈看見無家者真實生活後的問題：為何「居住優先」策略不被政府採納？〉，《報導者精選書摘》。取自 <https://www.twreporter.org/a/bookreview-precarious-living-homeless-people-and-the-helping-networks-in-taiwan>
- 黃微容（2014）。《都市景觀批判與重構：以臺南市海安路及神農區藝術造街與社區營造為例（1999—2013）》。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慧明（2004）。《我要活下去！遊民的生存策略和生活世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自昌（1995）。《遊民的社區生活與遊民服務——臺北市萬華社區的遊民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如翎（2014年11月29日）。〈你沒聽說、沒看過的臺北——跟流浪漢學街頭生

- 存之道》。【Blog 文章】。取自 http://jennietw.blogspot.com/2014/11/20141129_26.html
- 陳志軒（2018）。〈一般學校集中式特教班與特教學校智能障礙中學生污名困擾之比較研究〉，《身心障礙研究季刊》，16(2): 78-93。
- 陳依煜、連盈如（2015）。〈大學生精神病去污名教育介入成效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8(3): 421-447。
- 陳佳利（2014）。〈再現／去污名——精神疾病之展示研究〉，《博物館學季刊》，28(3): 67-86。
- 陳美華（2008）。〈不可告人的秘密？一個關於性工作研究中的性、性別與知識生產的反思〉，《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1: 1-39。
- 陳歆怡（2015 年 7 月）。〈【人文風景】李盈姿 翻轉視野 助街友自立〉，《經典雜誌》。取自 <http://www.rhythmsmonthly.com/?p=28493>
- 陳增穎、顏原達（2019）。〈雙重「被污名化的死亡」對遺族悲傷經驗影響之探究〉，《輔導與諮商學報》，41(1): 1-20。
- 許哲韋（2019）。《邁向無家者支援網絡——以臺北市為例》。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華孚、孔健中、黃千嘉、劉育偉（2014）。〈從底層階級到危險他者的「遊民」〉，《犯罪學期刊》，17(1): 1-37。
- 張依萍（2021）。〈臺灣公民募資的消費實踐（2012-2019 年）〉，《傳播文化與政治》，14: 39-86。
- 張虹雯、王麗斐（2015）。〈憂鬱情緒與求助延宕的關連：自我污名化、社會污名化與自我隱藏之仲介效果考驗〉，《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4: 37-68。
- 張淑麗（2009）。〈日常生活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0(3): 22-28。
- 張瀟文（2015 年 2 月 12 日）。〈超越《總舖師》！街友當起尾牙大廚〉，《商業週刊》。取自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7409&path=c>
- 壹電視 NEWS（2020 年 12 月 19 日）。〈新聞深呼吸 臺大博士募資集設「浪人食堂」助無家者夜市擺攤 重新自立！〉。【YouTube 影片】。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PYnb1DCfU>
- 萬毓澤（2007）。〈從日常戰術到“新革命主體”：論 De Certeau、Holloway 與 Negri 筆下的權力與抵抗〉，《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 57-131。
- 管中祥（2011）。〈弱勢發聲、告別污名：臺灣另類「媒體」與文化行動〉，《傳播研究與實踐》，1(1): 105-135。
- 管中祥（2018）。〈去除污名與自我培力：精神障礙者的社會對話行動〉，《新聞學研究》，137: 45-87。
- 黎士鳴、何政岳（2009）。〈接觸理論與社會距離：以精神分裂症為例〉，《臺灣

- 精神醫學》，23(3): 223-229。
- 黎士鳴、邱淑美、彭煒智、畢敦傑、許若魚（2010）。〈接納與排斥 HIV 感染者之污名化感受〉，《愛之關懷季刊》，73: 37-43。
- 賴若函（2015年2月5日）。〈他的街遊課，讓臺大教授也驚豔〉，《今周刊》。
取自 <https://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407/post/201502050041/>
- 劉俐均、吳東祐（2017年11月8日）。〈整頓國家門面 北市府下令遊民「行李集中」〉，《民視新聞網》。取自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17B08L04M1>
- 劉興偉（2010）。《客家流行音樂的創作與實踐：解析金曲獎入圍客家專輯》。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麗珍、張宏哲（2004）。《遊民問題調查、分析與對策研究》PG9304-0478: 093-000000AU631005。臺北市：行政院內政部社會司。
- 鍾岳明（2017年5月29日 a）。〈前街友的故事番外篇 王明俊：我的時間不夠用〉，《鏡週刊》。取自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526pol002/>
- 鍾岳明（2017年5月29日 b）。〈前街友的故事番外篇 謝仁星：流浪也要有尊嚴〉，《鏡週刊》。取自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70526pol003/>
- 羅彥傑（2018）。〈「失智」病症污名報導之流變：以 1951-2010《聯合報》檔案為例〉，《新聞學研究》，137: 1-43。
- 羅靖華（2021）。《非營利組織方案可規模化性評估——以人生百味為個案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 Walker, S. (2014). Organization in the crowd: Peer production in large-scale networked protes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2), 232-260.
- Buchanan, I. (2000). *Michel De Certeau: cultural theorist*.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Byrne, P. (2000).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and ways of diminishing it. *Advances in Psychiatric Treatment, 6*(1), 65-72.
- Chen, W.-H. (2015, Jun 23). FEATURE: 'Hidden Taipei' tours give unique perspective. *Taipei Tim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15/06/23/2003621376>
- Chaudoir, S. R., & Fisher, J. D. (2010). The disclosure processes model: Understanding disclosure decision making and post-disclosure outcome among people living with a concealable stigmatized identit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2), 236-256.
- Corrigan, P. W., & Penn, D. L. (1999). Lesson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on discrediting psychiatric stigma.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9), 765-776.
- Corrigan, P. W., Larson, J. E., & Kuwabara, S. A. (2010).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Public and self-stigma models. In J. E. Maddux & J. P. Tangney (Eds.), *Social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pp. 51-68). New York, NY: Guilford.

- Corrigan, P. W., & Lundin, R. K. (2001). *Don't Call Me Nuts!: Coping with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Tinley Park, IL: Recovery Press.
- Counter Publics. (2021, December 4). Critique of Separation-- Guy Debord-- 1961. [YouTub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aow-co3MRE>
- Daly, G. (1996). *Homeless: Policies, strategies, and lives on the street*. London, UK: Routledge.
- de Certeau, M. (1984/198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S. Rendall, Trans.). California,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 Certeau, M., Giard, L., & Mayol, P. (1990/199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volume 2: Living and cooking*. (T. J. Tomasik, Trans.). Minnesota,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oak, M. J. (2008). *Social welfare: Fighting poverty and homelessness*. Detroit, MI: Gale.
- Douglas, J. D. (1976). *Investigative social research: Individual and team field resear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 Downing, J. D. H. (2001).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NY: Sage Publication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NY: Anchor Books.
-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Inc.
- Goffman, E. (2017).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KD APP Reader version]. Retrieved from <https://a.co/d/cbTKTJf>
- Han, D.-Y., Chen, C.-H., & Li, S.-M. (2016). Effects of a natural contact program on decreasing self-stigma among individual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aiwan. *Archives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0*(1), 33-38.
- Holmes, E. P., Corrigan, P. W., Williams, P., Cancer, J., & Kubiak, M. A. (1999). Changing attitudes about schizophrenia. *Schizophrenia Bulletin, 25*(3), 447-456.
- Karinshak, C. B. (1996). Empowering homeless adults to learn: A journey toward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PAACE Journal of Lifelong Learning, 5*, 57-66.
- Kim, U. (1994).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and elaboration. In U. Kim, H. C. Triandis, Ç. Kâğıtçıbaşı, S.-C. Choi & G. Yoon (Eds.),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s* (pp. 19-40). London, UK: Sage Publications.
- Lefebvre, H. (1971/1984). *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 (S. Rabinovitch, Trans.). London, UK: Allen Lane.
- Lefebvre, H., & Levich, C. (1987). The everyday and everydayness. *Yale French Studies, 73*, 7-11.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California, CA: Sage Publications.
- Passavant, P. A. (2004). Introduction: Postmodern republicanism. In P. A. Passavant, & J.

- Dean (Eds.), *Empire's new clothes: reading hardt and negri* (pp. 1-20). London, UK: Routledge.
- Riley, G. A., & Baah-Odoom, D. (2010). Do stigma, blame and stereotyping contribute to unsafe sexual behavior? A test of claim about the spread of HIV/AIDS arising from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ory and the AIDS risk reduction mode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1(3), 600-607.
- Wasserman, J. A., & Clair, J. M. (2010). *At home on the street: People, poverty, and a hidden culture of homelessnes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The stigma of being homeless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the tactics of their everyday life practice

Vicki Chi-Hsuan Chiu *

ABSTRACT

The homeless refers to people who live on the streets without a fixed place.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education has a limited effect on breaking through the stigma of being homeless. To reverse public prejudice requires long-term efforts to change the underlying social values. Successful everyday practices and tactics not only remove the stigma of homelessness, but also allow homeless people to interact with society.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studies in Taiwan on de-stigmatization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disadvantaged people,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and long-term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tudy on the homeless.

This paper is mainly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wo research purposes: 1) Discuss the tactical operation methods of homeless people in Taiwan in daily life practice. 2) Analyze the effects of tactical operations in daily life practices of homeless people in Taiwan.

This paper uses the theory of stigma and everyday life, adopts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data by three methodologies: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narr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tactical operation

* Vicki Chi-Hsuan Chiu, Dean of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uty Dean of School of Mass Communication,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E-mail: chchiu223@hotmail.com.

of the homeless in Taiwan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tactics: strive for space fragmentation, combination of dissidents, countermeasures, symbol appropriation, secondary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frame.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veryday life practice and tactical operations of the homeless in Taiwan from three aspects: display of subject initiative, behavioral tendency of individu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location. The tactics summarized above from the theory of daily life are also similar with and correspond to several ways in which those stigmatized respond to situations, as proposed by Goffman (1963, p. 9-12). This is a means of “directly correcting the objective basis of what he regards as a defect”. Some “secondary creation” tactics allow the homeless to benefit through stigm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frame” tactic allows the homeless to “reversely evaluate ordinary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themselves, and there are also some limitations.” The “combination of dissidents” tactic can help the homeless “deliberately engage in certain activities that others find difficult for him to engage in.”

In addition to using multiple spatial locations, these six tactics also show a certain degree of subjectivity and positive transformation behavior of the homeless. This study observ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splay of subject initiative”, “behavioral tendency of individu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location”. Those weak “display of subject initiative” tactics such as “combination of dissidents”, “secondary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frame” adopt more dotted styles in the “spatial location”, which is carried out in a guerrilla manner. However, because of its strong implement, the effect of “behavioral tendency of individual transformation” is excellent, which forms better mainstream shifts such a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opportunities as an influence.

While de Certeau’s daily life theory focuses on the operational logic or process of use, this study targets more on the “spatial location” obtained by

Taiwanese homeless people using daily life practice tactics. de Certeau's "spatial location" refers not only to physical space, but also to Goffman's concept of "bounded area". Taiwanese homeless people (theatrical troupe) present a "socialized" performance and based on this shape and modify it to adapt to social understanding and expectations and carry out "image management."

This study finds that de Certeau's view (1984) - in which using tactics constantly involves seeking opportunities for resistance on the fringes, and that these gains cannot be maintained in specific locations - is not entirely correct. Victories achieved by the stigmatized such as the homeless by the tactics of daily life (bottom-up) may also likely influence capitalist producers to develop another strategy (top-down), which may also become a "stability space" (formal, official, regulatory, surface). Thus, ordinary users without capital do not necessarily need to resist all the tim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get closer to homeless people and find meaning for their daily life tactics, which is its first research contribution. In the past the theories of daily life were mostly based on written discourses, and there was no structural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study aims to use the three effects of "display of subject initiative", "behavior tendency of individual transformation", and "spatial location" as the main body of analysis to discuss their interaction, which is its second research contribution. This study further combines de Certeau's daily life theory and Goffman's stigma theory for analysis of the topic. It is known that "display of subject initiative" may also be Goffman's front stage performance and re-confirms that "it is not that power is unimportant or has no influence, but it is difficult to perform without daily life" and other concepts of individual daily self-performance (Goffman, 2017).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ommon presence and encounters of homeless people in Taiwan, this study also complements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in the

original Goffman study on “how the mechanism he described enters and internalizes humans”. This is the third research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We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of review and suggestion. First, this paper took six years to cover 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s. In the recent two years, due to COVID-19, many observation fields could only be conducted online, and it was a pity that various details could not be fully observed. This is one shortcoming of this study.

Second, as homeless counseling agencies do not recommend that researchers contact homeless people by themselves, most homeless people contacted in this article are “former homeless” or “successful homeless people” who have escaped from homeless life. While these “successful homeless” may be familiar with the daily life practices and tactics of homelessness, their perspectives may differ from other homeless people. In addition, most homeless people in this study participated in some activities of organizations. Does doing so maintain the existing hegemonic narrative framework? This is also an issue we find worthy to evaluate.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can further think about better fieldwork methods based on this point.

Third, the main research field of this paper is biased toward northern Taiwan. The daily life practice and tactical operations of the homeless in northern Taiwan may be more diverse and exciting.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future researchers focusing on homeless topics may conduct research on central or southern Taiwan and thus potentially draw more complete research conclusions.

Keywords: everyday life theory, homeless, stigma, tactics

